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巫小黎

一

唐弢引起读者和文学界的关注，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从杂文创作步入文坛的他，文风颇似鲁迅，几可乱真，还引起过些小误会。那时，他才20出头，是上海邮政局的一名邮政工人。1959年，他进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学术研究为业，成了一名学者，曾担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的领导工作，任过《文学评论》副主编。工作对象和职业的变更，并未改变其作家的身份底色，他留给世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一个爱书胜过新婚妻子的书痴。写杂文，写书话，研究鲁迅，宣传鲁迅，是他一生最爱最感兴趣的志业。从进入文坛开始，一直念念不忘自己独立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事有凑巧，天降大任。后来，他还真的主编了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如今已逾不惑之年，1980年代，曾就读大学中文系的中年人，大概对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多不陌生。至如今，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我，不再是概念、术语和生涩的名词和没完没了的纷争，而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绚烂多姿的人生画卷、交响诗章。文学史中，有人、有事、有文，有情趣，有形象，有意境，有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留洋的“海归”，国内长养的“土鳖”，无不生机勃发，气象葱茏，个性分明。阅读、积累，质疑、慎思的结果，在我脑海中，慢慢复活了一部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个华丽转身，《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再名目可憎，令人生厌，反倒成了学生们最爱的一门课程。看来，问题显然不在现代文学史本身，而在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唐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人。而且，20世纪上半叶，其居住、工作的上海，恰好是全国的文化、出版中心，几乎所有的出版物，都从上海流向全国各地，即便编辑部设在北京的刊物，譬如《新青年》《语丝》《文学杂志》等等，印刷、出版都在沪上。唐弢又是一个喜爱读书、评书、品书、写书，还大量藏书的书迷，得天独厚的优势而至于此，能有几人？倘使唐弢只把自己熟悉的人、书、事，以及人书之间的故事写将出来，就会是一部很生动很精彩、且极富神韵和个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二

然而，唐弢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却令人遗憾。譬如，经唐弢亲自修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五章第二节“语丝等社团流派和闻一多等人的创作”，给周作人的小品文下的断语是“内容空疏”、“意味消沉”。对现代象征诗派的评价，几乎没有可取之处，笼统地视之为“当时诗歌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在我国新诗发展过程中，象征派所起的作用是反动的”，她的开山祖师和代表人物李金发的诗作“大多是一组组词和字的杂乱堆砌，连句法都不像中文。这种畸形怪异的形式，除了掩饰其内容浅陋之外，正便于发泄他们世纪末的追求梦幻、逃避现实的颓废没落的感情。”

而1937年之后的大后方和沦陷区文学，评价高低，姑且不说，许多作家甚至连名字在书中都找不到。今天被当做一流作家、优秀作家对待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师陀、无名氏、徐訏、路翎、穆旦等，在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均未给予应有的席位。

现代文学在面向全球的开放格局中降生、成长、发展、壮大，如今已是普遍的常识，早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主体，多半有留学背景和国外生活的经历，渊源有自，出身书香之家的子弟也大有人在。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极深。这些，都是极具研究价值的专题，而唐弢著《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没有给予合适的篇幅，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即便留下浮光掠影轻描淡写的三言两语好像都玷污了自身的圣洁和纯净似的。至于近年受到普遍重视，文学史地位迅速提高，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劈出一片新天地的通俗文学，压根儿还是近10多年，文学史观念变革之后，重绘中国现代文学版图的结果。

然而，倘若据此认为唐弢趣味偏颇、视阈狭窄，抑或笔力不逮，那可是对唐弢莫大的误解。从青年时代起，唐弢就非常欣赏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论说。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一直是他时时翻读的两部书。他曾在许多场合，反复说过这样的话：“我在自修生活中一度舍哲学而就历史，后来又少写杂文去做编写文学史的准备”。文学史撰述准备时间之长，自觉意识强烈而突出，有据有证。

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理想，与实现理想的能力，不能看做同一码事，这是常识。然而，事实证明，唐弢并非仅有著史之志，而缺史家之德与识的平庸之辈。业界没有谁敢怀疑唐弢的“史德”、“史识”和“史才”。别的不说，只拣一件足以资证。上世纪30年代，唐弢与鲁迅熟识后，鲁迅欣赏他的史学修养，即问能否参考日本《近代文艺笔祸史》，以政治内容为主，编一部近代中国文网史。

唐弢的眼力世人公认。再看，唐弢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关于重写文学史》《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等等，就不能不惊叹他的史才与史识，也打从心底佩服唐弢的眼力。以上文章，几乎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破冰之作，视界宏阔，史料翔实，逻辑谨严，立论得当。均在学界赢得阵阵喝彩，给学科发展带来新的刺激和发展活力，同时也启发了一批年轻的新锐。当年亲炙唐弢教诲的刘纳、杨义、蓝棣之等，一个个都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做出了令人注目的业绩。

三

唐弢做研究，不搬弄各种吓唬人的理论，而是坚持从对象出发，以史料为基础，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前提下做出个人的评判和独到的论断。语言、文风自成一格，体现出十分扎实的学术功力和优雅、大度的学术气量。

1980年代，轰轰烈烈的“重写文学史”，虽然不完全是针对他主编的那套《中国现代文学史》，问题的展开和话题所及，由古到今，从中到外。但他主编的那套现代文学史，显然划入清算之列，且是重点所在。果真“重写”，等于自我否定与自我颠覆。他是这套教材的主编，同时，他又是现代文学史这个学科第一代学人中的重要代表和奠基者之一，尴尬与窘困，可想而知。然而，他没有回避问题，推卸责任。诚心诚意检讨、反省，承认局限，推倒重来，该个人担责者决不推诿，他说：“想到书中的缺点，始终负疚于心”。1980年代前后，他的著述和谈话，不少篇章都在孜孜矻矻的自我纠错，其虔诚、勤勉，令人感怀。“譬如说对左翼作家联盟，功过两端，我们都叙述得不够充分。”左联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使文艺团体具有政党性质，排斥了许多很有作为的进步作家，实行关门主义；同时又用机械唯物论的观点，不加分析地批评所有在《新月》杂志上写稿的作者，以及某些所谓‘第三种人’”，“将自己划在小小的圈子里，和广大的人民群众隔绝了”。就文艺团体而言，论述失之偏颇，不限于“左联”，还有许多社团、流派，评价都不够公允。唐弢以“左联”为例，结合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的体会和认识，历史而客观地评价“左联”的是非功过，令人不容置辩。尤为普遍且敏感的，是对作家及其创作的论说，对此，唐弢坦言“就作家的评价而言，现代文学史对郁达夫、老舍、沈从文、徐志摩、钱锺书、杨绛等的评价确实低了一点，我曾在1985年9月富阳召开的郁达夫纪念会上做过检讨。我认为通过具体分析，适当地提高这些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必要的”。“我认为徐志摩在新诗建设上有过功绩，他的《山中》《再别康桥》等确是名篇，虽然不多，却已经十分难得了。沈从文卓然大家，长篇如《边城》，短篇如《丈夫》《八骏图》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像以徐志摩、沈从文等为代表的那些文学流派，我认为，“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肯定的流派，评价应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说到周作人、李金发、戴望舒等等，他也深怀歉疚，所以，后来他提醒学界，“李金发，我们也不能忘记他”，戴望舒的诗，如《雨巷》《乐园鸟》《偶成》都“写得很好”。曾是这个学科领袖群伦的权威，公开说出这样的话，实事求是地自我检讨，需要何等的气度？得罪许多人不要紧，弄不好被扣“犯上”的罪名，也不是没有可能。

四

在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和浪潮中，唐弢一直十分清醒，始终不失一个学者的睿智和理性，“我的希望有一部较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部较为实事求是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却是一片至诚，毫无私心，完全可以对天盟誓”。

年近耄耋的老人，痛心疾首，实不多见。“对天盟誓”释放出来的信息，除了证明他的炽烈、坦诚之外，还留给我们不少想象和勘探的空间，内中隐曲，非外人所能知也。因此，他毫不含糊地，在不同场合反复吁求，给予文学史著述以更多的自由，“文学史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写法，不应当也不必要定于一尊”，今后的文学史著，“决不能像过去一样，将一部文学史写成左翼文学史”，这种自省、自新的姿态，令人动容。

业界知道，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习惯称“部颁”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并不代表主编本人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观点。“说是‘主编’，其实是有点夸大的，因为除了通读全书外，我个人承担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虽然也做过一些规定，提过一些意见。然而限于体例，又不得不自动撤回，主要还是集体的力量，大家的功劳。”唐弢说的，句句是实情。自谦的成分和身不由己的苦衷，兼而有之。

他用事实告诉我们，“60年代初写这部文学史时，正当史学界讨论‘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问题到达最后阶段的时候。我是主张‘论从史出’的”，“文学史嘛，无非是告诉人家文学的历史发展，把材料整理一下，把文学的发展过程和事实讲出来，加以说明和分析，至于结论，让读者去做”，总之，“重要的还是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主”。讨论的结果，真理败给了权力，“当时讨论的胜利者却是‘以论带史’派，我们这部文学史也深受影响”。在框定的理论架构内著史，与主张“我如果写，就写一家言”的唐弢，在学术个性上简直风马牛不相及。

研究思路和治学方法，都违背唐弢本人初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主编者，出于对历史负责考虑，叙录历史经过，寄望于来者，岂不正在情理之中。

姿态和主张，若能与身体力行的研究著述实践结合，说服力更强。拿出让人信服的成果，是最好的纠偏补弊，于是，《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我观新诗——蓝棣之作〈正统的和异端的〉代序》等，相继发表。这些，可谓是唐弢自我反拨的代表作，真正代表了他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他亲力亲为的重写文学史实践，给了其时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很多启示，激发了研究者的热情，一批富有新见的现代文学史，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相继问世，现代文学研究掀开了新的历史新篇章。

回眸唐弢学术历程的意义，我以为，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始终如一地保持学人的价值理性和学者良知，在意识形态生产和学术独立之间，找寻一个支点，平衡或舒缓学术个性和僵化体制之间的紧张关系。

唐弢领衔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大学中文系教材的使命，业已完成。若不是研究学科史，一般读者，乃至有志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青年，大概不会再触摸或提起这套教材。然而，一个人领军挂帅，一伙人蜂拥而上的集团化知识/学术生产机制，非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日益侵害学术肌体的健康，妨碍学术个性的发育和生长，值得我们警醒。唐弢曾说，教师的作用就是启发学生思考，“引导他们向正确的方面探索”。“不然，处处依靠人家，你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样的人只能人云亦云，不动脑筋。”长此以往，学术创新从何谈起。30年前，悖反常理，扼杀个性和创造性，只生产工具，不培育人才，唐弢深以为忧的问题，30年后，更成学界的常态，以致竟相效仿的时髦。我们能不深长思之?!

唐弢书话内外

□子 张

一

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着眼，说唐弢具有作家、学者和教师、以及新文学图书收藏者这样三重身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自1930年代到1980年代的50多年间，唐弢的名声虽然并不是特别显赫，但却是众多左翼文化人中的重要一员。和他的作家、学者、新文学图书收藏者的三重身份都有着某种关联，他的声誉一部分来自他众多作品中的一个品种，即新文学书话。

书话，单纯从字面上理解，也可以解释为“话书”或“书之话”，即对于图书的介绍与评价。对这个民国以后才出现的文体，唐弢由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诗话”、“词话”、“曲话”和“以文献为主，专谈藏家与版本的如《书林清话》”总结过他所谓“书话”的文体特征，即“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又表示他欲企及的目标是：“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似的抒情”（《书话·序》1962）。若干年后重订《晦庵书话》时又进而提炼出作为“散文”的书话之理想要素：“一点实事，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晦庵书话·序》1979）。在同时期的另外一个场合，他再次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也可以视为对那个观点的一种解释、一次明确与强调：“而书话的形式也确是多种多样的，怎么写都可以。但我反对有些人把书话仅仅看作资料的记录，在更大的程度上，我以为它是散文，从中包含一些史实，一些掌故，一些观点，一些抒情的气息，给人以心地舒适的艺术的享受”（《〈林真说书〉·序1982》）。

细察唐弢关于书话前前后后三次表述，可以看出对书话文体的个人界定和理想在大同中存在着小异，即是由最初的有所“偏重（知识）”、“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而逐渐趋于“知识”与“艺术享受”并重，形成了所谓“四个一点”或“四个一些”即“史实、掌故、观点、抒情气息”四者并重的书话体散文的个人观点。这个“史、故、观、情四者并重的书话体散文观”恰恰又对应了唐弢作家、学者、新文学图书收藏者的三重身份。因为热衷于图书收藏，所以有撰写书话的特别条件；因有学者眼光，故注重史实和观点；因固有的诗人气质和散文家情怀，而执著于抒情气息与图书后面的轶闻掌故。如此理解唐弢的书话观以及个人书话风格的生成，应不至大谬吧？

二

照唐弢自己的说法，他的“检书、买书、读书、写书”的62年，是经过了一个从“一般买书”到“有目的地买书”终至于对书的感情“渐渐地淡下去”的过程。他在晚年撰写的短文《我和书》回忆这一过程详尽而兼带耐人寻味的大感慨，从1927年到1941年，他自谓属于“一般买书”阶段，15年中，“就零星购了一些文言著作”和“一些‘五四’以后的白话书，随读随扔，所余不多”，至1942年，日军入侵上海，“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当作废纸卖书”，这才开始“有目的地”、“大批购书”，买书的重点则是“偏于‘五四’以后”。1959年9月从上海调北京，此后开始另一段购书生涯。

既有存书，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成了“藏”书家，撰写书话的客观条件毕竟具备了，这就有了1945年春天“蛰居上海，有时披览书籍，随手作些札记”之举，开始了唐弢书话撰写、发表、出版、再版乃至于被尊奉为“在书话创作方面总其大成”的书话“大家”之旅。

唐弢书话最早见载于《万象》，继而大量发表于《文汇报》的“世纪风”和“文化街”，后来《联合日报》（晚刊）、《文艺春秋》《动力文丛》《文讯》《时与文》以及香港《大公报》都或多或少地刊载过。这可以算是第一阶段，前后写了一百二三十篇之多。第二阶段始于1956年《读书月报》之约，先后在该年第10、11、12期和1957年第1期发表了《开场白》《域外小说集》《画册的装帧》《线装诗集》《儒勒·凡尔纳》和《药用植物及其他》6篇，其后1961年4月5日开始在《人民日报》副刊连续发表，至1962年6月1日，前后又发表20余篇，终至在1962年6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唐弢第一本书话集，书名就《书话》二字，收入其中的除了新撰的书话，亦有“选改”于旧作的。然这一阶段或可说还有后续，即1965年后半和1966年初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书城八记”系列，随后“文革”开始，这一阶段才算结束。第三阶段是一跨13年后的1979年，作者将1945-1966前后20余年中撰写的全部书话结集为《晦庵书话》并新撰序言，翌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此后虽仍有书话体散文写作，但不再有先前专以“书话”标示的连续刊载了，直到1990年代离世后别人编辑的《唐弢书话》《唐弢文集·序跋书话卷》出版，所谓唐弢书话才算有了比较全面的终结。

三

但是，说是“终结”，仅仅只是就初步的归纳而言，对于唐弢书话由内而外的更为细致的观察和疑问，仿佛才刚刚开始。下面只想就唐弢书话由民国进入共和国阶段后其书话写作、“选改”方面出现的一点点异乎寻常的变异稍作勾勒，以猜度时代变迁给唐弢创作心理带来的微妙触动。

我最早接触唐弢书话，是1981年10月在济南齐鲁书社购买1980年9月第1版《晦庵书话》之时，当时所喜的是三联书店版的这本书别致的装帧设计和里面关于新文学作品、期刊的有趣介绍。然说来奇怪，我竟没有全部地、认真地逐篇读完这部厚厚的书话，更没有能力以学术眼光打量它的来龙去脉，因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刚读过两年专科中文的20岁小青年，对类似“出土文物”一样的中国新文学正睁大着一双好奇和惊讶的眼睛，哪里具备深度解读甚至指谬辨析的素质呢！而今将近30年过去，再次打开《晦庵书话》，仔细研读两篇序文、五个部分共167篇书话，结合如今能够看到的唐弢创作系年和其他资料，倒慢慢读出一点意味来了。

其一是写于共和国时期、“文革”之前主要是《人民日报》上的书话在选择所话之书、话的语言措词方面较之民国时期的书话有了相当大的差异。1961、1962两年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新撰书话凡20余篇，如《骈肩作战》，如《革命的感情》，如“翻版书”和“关于禁书”两个小系列，以及《“奉令停刊”》等等，所选尽是“左翼”之书，所议尽是“斗争”之事，所操尽是“革命”之语。不用说，这自然是冷战时代海峡两岸共同的政治“一边倒”现象的结果，因为即使在这些故事发生的当年，唐弢书话也绝非这种风格，那么，对于唐弢本人而言，这样的变异意味着什么呢?

其二是一部分“选改”于民国时期、重新发表于“文革”之前《人民日报》的书话的确是有“选”有“改”。譬如《绕了她》《闲话〈呐喊〉》《半农杂文》《撕碎了的〈旧梦〉》约十余篇正如唐弢本人所说“就手头剪存的部分选改十几段”，之所以“选改”，自然也还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变迁和话语的转变，即如《绕了她》中若干处“反动派”云云，固然亦不像是1945年初刊于《文汇报》时的口气吧?不过相对而言，因为毕竟是旧作，某些篇什还是保留了较为纯正的味道，如《两本散文》之赞誉梁遇春为“文体家”，《朱自清》之推崇朱自清散文的“情致”，就仍然流露出唐弢作为学者的诚实。

其三是到了“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重编《晦庵书话》而收入的民国时期书话，仅从措词上也能判断出有所改动。这里说的是写王统照的《山雨》，此文原刊于1947年初《文艺春秋》杂志，收入《晦庵书话》时出现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谓其宣传阶级斗争”这样的表述，或许于史实相符，但措词已然带上冷战时期的政治色彩。

四

凡此种种，称其为在时代转换后导致个人写作风格“异乎寻常的变异”，意在猜度作为作家、学者和新文学图书收藏者的唐弢其创作心理究竟是真诚的与时俱进还是一种不得已的写作策略还是两者兼具?好在当年的当事人、约请唐弢在《人民日报》撰写书话的姜德明后来谈到此事，似乎可以给出部分解释，他说：“当他刚刚安好新居，我就贸然闯入，请他为我们写书话。他答应了，却流露出某种顾虑，问我：‘现在还有读者对这类文章感兴趣吗?党报上介绍旧书版本会不会有人反对?’我打消他的顾虑，并同他一起商定，可以先从革命书刊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书刊谈起，再一步步地涉及进步文艺，如文学研究会的诸大家和巴金等。所以，晦庵的书话一开张，便谈李大钊、鲁迅，以及国民党的禁书和革命者的伪装书。至于含有书斋趣味的藏书票、藏书印、线装书籍装帧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1962年，作者在出版《书话》单行本时临时补入的”（姜德明《现代书话丛书·序言》1996）。

还可以比照的是，在《人民日报》约稿前的1956年，他首先在上海《读书月报》上发表《域外小说集》《画册的装帧》《线装诗集》《儒勒·凡尔纳》和《药用植物及其他》，《人民日报》之后的1965和1966年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书城八记”系列，从题目到内容都并不格外“左翼”，而多为纯正的书话体散文。看来，也许真的是“党报”性质和对于特定读者趣味的疑虑决定了《人民日报》时期唐弢书话的革命政治色彩，“先从革命书刊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书刊谈起，再一步步地涉及进步文艺”，显然有出于写作策略考虑的因素。这种写作策略导致的书话风格“异乎寻常的变异”，就连当时的评论者都注意到了，以至于将其视为书话的“不足之处”，并且建议作者“反动作家的书刊等也无妨谈谈，因为后者还可以作为反面材料来教育读者”（榆屋《别致的〈书话〉》1962）。而到了1979年，尽管时风已变，民国时期较为中性的书话皆可收入《晦庵书话》，但某些依然涉及政治性“禁书”的书话，还是被作者习惯性地添加上了时代话语。

一部《晦庵书话》，伴随着时代的不断转换，竟有着如此曲折幽微的文字修辞变迁和书外故事，由此观人观史，不亦深致而多趣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丛刊2012年第3期目录

诗歌研究
冷热不调：浪漫主义在中国新诗中的遭遇……西 渡
初识浪漫：清末民初中国作家眼中的雪莱……张 静
论现代诗的“抽象的具象化”……简政珍
当代汉诗游戏论述的省思……郑慧如
罗伯特·白英《当代中国诗选》的编撰与翻译……李章斌
于赓虞集外诗文辑录……王 贺 辑 校
“恶魔诗人”之后
——于赓虞的异域抒写及边地言行……王 贺

文学史研究
南社等革命党人的北京想象与书写……季剑青
修辞的意味：晚清政治小说中的“寓言”和“演说”……魏朝勇
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的现代派”之互文
——重读《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韩]金南希
抗战语境下的文化重建构想
——陈铨与李长之对“五四”的反思之比较……丁晓萍

作家作品研究
论巴金的《俄罗斯十女杰》及相关的女性英雄……刘慧英
祥林嫂和子君的“隐性自杀”探微……袁国兴
重审沈雁冰批评鸳鸯蝴蝶派的意义……谢晓霞
汪曾祺、张中行的“品人”散文及“立人”思想……刘长华
路遥苦难叙事的限度……白 浩

文献史料研究
冰心1937年在巴黎的一次演讲……刘 涛
邵洵美在孤岛时期的抗战文艺活动述略……张新民

书评·综述
何谓中间物，哪一种进化?
——评何浩《价值的中间物：论鲁迅生存叙事的政治修辞》……符 鹏
多民族文学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构建……单宏军

编后记

主编：吴义勤 温儒敏 邮发代号：2-667 投稿邮箱：ckbjb@wxg.org.cn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现代文学馆 邮编：100029